

20世纪国际汉学的趋势与偏向

作者：桑兵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5-9-19

二战前后，海外中国研究截然两分。要言之，前此重古代和文献学（或语文学）方法，后此则重近现代和社会科学（含人类学）方法。这一变化自有其必然与进步，但上升的螺旋之下，也不免曲折起伏，在一定程度上打断了前人由四裔而本土的努力，使中国研究重归旧途。由此带来的四裔偏向，既表现为研究方面，更在于研究方法，从而导致该领域的表面繁荣与潜伏隐忧。从具体的人脉关系探讨其变化的脉络，以及中外学术界的相互影响与隔膜，不仅有助于把握未来趋向，更为建立中国研究的学术大道所不可或缺。

第一节 由域外到本部

如果说战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后来居上，战前的国际汉学界却几乎是法国的一统天下。1920年代留学法国的李思纯一言以蔽之曰：“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本世纪初的国际汉学泰斗沙畹（Edouard chavannes）认为，中国学是由法国传教士所开创，并由法国学者雷慕萨（Abel Remusat）与儒莲（Stanislas Julien）等人所组成的一门科学。傅斯年则称：“中国学在西洋之演进，到沙畹君始成一种系统的专门学问。”沙畹以后，西洋中国学的大师分为巴黎与瑞典两派，而后一派的台柱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学术渊源仍是师承沙畹”。此外，在苏俄、美国汉学界位居显要的阿列克（V.M.Alexeif）和叶理绥（S.Eliseeff），也是巴黎学派的弟子门生。因此戴密微（M.Paul Demieville）说：“中国学在西方，在骨子里仍是一门法国的科学。”留法社会学者杨亦称：“中国学’不仅是一门西洋的科学，而且还几乎可以说：它是一门法国的科学。”领导巴黎学派正统的伯希和（Paul Pelliot），自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祭酒。

汉学在欧洲登堂入室，成为本国学术的一部分，得益及体现于相互关联的两个方面，其一，学者的专门化。“从前欧洲研究东方学的人，大半是‘海关上的客卿’、‘外交机关的翻译’或‘传教师’出身，本人既不是严格的科学家，也不是素来即有志研究东方学问，所以他们初期的著作，比较本国的学者，往往稍欠精确。比方史料来源的批评，鉴定史料的可信程度，在德国自尼博尔（B.C.Nibuhr）、栾克（L.von.Ranke）以后，史学家对史料的来源、记载、口传、与古物的分别，清清楚楚，一丝不苟。对于记载是原形抑或副本（外部的批评），著作人是否愿意报告事实（内部的批评），都是慎加选择，宁缺疑，不愿轻信。”而德国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F.Richthofen）不懂汉语，竟写成多卷本巨著《中国》（China, Ergebnisse eihener Reisen und darauf gegründeter Studien），对中国地矿学研究贡献甚大，但引据谬误极多，对德国汉学反有不良影响，“投机作品，如雨后春笋，一似汉学著书为不学而能者。”这种状况到沙畹时开始转变，用伯希和的话说：“夫中国有史三十世纪而迄未间断，其雄伟深奥，确可成一独立学科而有余，盖非久涉猎之士，不经训练所能操觚者矣。”西洋正统学术方法被运用于中国研究。因而与一般情况相比，“近来法国‘河内派’-法国的沙畹、伯希和、马斯柏楼（Henri Maspero，通译马伯乐）等都在安南河内久任教职-自然比较算是例外”。1919年1月，法国总统在商业地理协会印度支那部演说时称：“法国研究中国，已自从来之散漫状态中成为一般学术上之正统，而认为一科；是故研究中国者，正所以为法国之学术。”视汉学为法国的“国学”。

其二，重视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沙畹、伯希和之前甚至与之同时，“不少的西洋汉学家，每但以西洋的汉学为全个范畴”，无视中国前贤及当代学者的成果。而巴黎学派诸大师的态度完全不同。伯希和认为：“中外汉学大师之造就，堪称殊途而同归，尤以清初康熙以来，经雍乾而至道光，名家辈出，观其刘获，良足惊吾欧洲之人。此果何由，亦由理性之运用与批评之精密，足以抑制偏见成说。其达到真理之情形，实与西方学者同一方式。”“心向既久，不禁对继承前辈学者的当代中国学人，也‘寄有无限之敬重与希望’”。高本汉则责成自己追随清代学者的开路工作，而把现代西方语言学方法应用于所整理过的材料。傅斯年在高著《中国音韵学研究》中文版（商务印书馆1940年）序言中说：“高本汉先生之成此大业固有其自得之方法，然其探讨接受吾国音韵学家之结论，实其成功主因之一”。同时他还认真收集中国当代学术书刊，以追踪中国同行的研究。高氏晚年称：“我毕生从事中国文化的著述，只有爱护本国文物历史而从事研究的中国学者是真正的知音。”

受此影响，国际汉学的研究趋向由单纯四裔进而沟通中外，表现有三：一、对中国文献的理解力提高，重视程度加强，中外资料会通比勘。二、与中国学者的联系交往增多。三、开始研究纯粹中国问题。“本来中国学在中国在西洋原有不同的凭藉，自当有不同的趋势。中国学人经籍之训练本精，故治纯粹中国之问题易于制胜，而谈及所谓四裔，每以无比较材料而隔膜。外国学人能使用西方的比较材料，故善谈中国之四裔，而纯粹的汉学题目，或不易捉住。”这种情形到沙畹-伯希和时期大为改观，沙畹因在中国实地研究的经验，“深感到中国文化须与中国实际社会相接触，须能利用中国近代学者的研究结果以作参考，并须视中国文化为一活的文化，而非一死的文化，然后中国学方能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其译注《史记》，广征博引中外典籍，堪称范本。伯希和则“对纯粹中国材料认识之多，在北平学界亦大可惊人。”他进而提出：“治‘中国学’须有三方面的预备：1、目录学与藏书。2、实物的收集。3、与中国学者的接近。”“希望嗣后研究中国学问，须中外学者合作，以补以前各自埋头研究之缺陷，及使世界了解中国文化之真价值”。

同时，伯希和还扮演了国际汉学界警察的角色，沙畹逝世后，他参与《通报》（T'ong bao）的编辑，1925年起成为主编，“他把这份杂志办成了类似汉学界的法庭”。在其主导下，巴黎学派不满于既有的四裔研究，鼓励深入中国内部。当时欧洲汉学家的态度有二，一是将中国文明作为与印度、埃及、希腊罗马文明并驾齐驱的世界文明之一，视为纯粹学智的对象，以法国为代表；一是从本国的政治、贸易等实际利益出发，英、德、俄为典型。“研究中国古代之文化，而能实地接触当今代表中国之人，此种幸运，绝非倾慕埃及或希腊者所可希冀。知有此幸运而能亲来享受者，沙畹为第一人。”而伯希和“治中国学，有几点绝不与多数西洋之治中国学者相同：第一、伯先生之目录学知识真可惊人，旧的新的无所不知；第二、伯先生最敏于利用新见材料，如有此样材料，他绝不漠视；第三、他最能了解中国学人之成绩，而接受人”。有鉴于伯希和沟通中外，充分利用中国学人的成就，傅斯年呼吁中国学者“仿此典型，以扩充吾人之范围”。日本京都学派与巴黎学派相呼应，是时塞外民族史料层出不穷，西域研究盛极一时，狩野直喜在宫崎市定赴欧留学之际告诫道：敦煌研究也要适可而止。或许西方学者以为日本人只对敦煌有兴趣。一般应先入中国本部，有余力再及于塞外。

尤为难能可贵的是，内藤虎次郎、狩野直喜等人更进而提倡师法清学，按照当代中国学者同样的方法与观念治中国学术。伯希和时代西方汉学的成熟，以整个欧洲学术的发展为背景和依托。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证史学在欧洲占据主导，受科学化倾向的制约，考古和文献考证日益成为史学的要项。法国势力最大的写实派史学家古朗日（Fustel de Coulanges）声称：“在最细密处去直接解析遗文，只相信遗文所指出的意义”。这种重视文献与考古的研究，使汉学逐渐脱离以往两种偏向，即不通中文只据西文的道听途说，和虽识中文却不加分析的以讹传讹，与清学颇为接近，但核心仍是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用以研究中国，往往有失文化本色。以中国固有方法整理文化遗传，不可或缺。受导师的影响，仓石武四郎、吉川幸次郎等人留学北京，实地学习中国的学术方法。

第二节 方法与文献

然而，西洋汉学正统的语文学方法引起一些学者的不满，在巴黎学派内部，率先起来纠偏的便是葛兰言（Marcel Granet）。葛氏是汉学家

沙畹和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的学生,并深受社会学家莫斯(Marcel Mauss)的影响。他批评“一般旧派的史学家或中国学家,不是仅以考证为能事,就是虽有解释而仍是以主观的心理的意见为主,故貌似科学而实极不正确,极不彻底,故远不如杜氏所倡的社会学分析法为高明。”对于清代考据学的成就,其评价也低于伯希和等人,认为所致力于上古遗留经传的考订,进步甚大,“但是中国学者向考据这条路一直往前走,不免往往太走远了一点。中国考据的进步,好像都认为这是批评的精神在那里生出影响。虽然已有如此煌赫的结果,我应当立刻的说:引起这种考据批评的精神一点也不不是实证的精神,并且不能真正算是批评。这种批评的缺点是:专心于作品而不太留意其中故实。他的原则都是一种用理智眼光来考究圣经的原则,而从来便未尝致疑于这种理智眼光的前提是否适当的。”因此,他倡行将社会学分析法引入中国研究领域,撰写了《中国古代节令与歌谣》、《中国人之宗教》、《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等著作,开创了西方汉学崭新的社会学派。

葛兰言的新方法,有人概括为“伪里寻真”或“伪中求真”,乃是将历史学的内在批评、社会学的同类比较和事实分析三法并用。对于古代文献记载,其看法是:“这件事未必存在,而用笔写这件事的人的心理是确定存在的。”他从文献中所搜寻的事实,便是后一类型的社会事实,然后应用社会学观点,对于事实作一精细的、比较的与全体的分析,以便从中自然而然呈现出一种说明来。依照杨 的看法,其《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一书的绪论,“不仅是葛兰言方法论中一个很好的说明书,而且是他向整个的中国学界一种革命的宣言。”而首当其冲的对象,便是伯希和、高本汉等人所代表的正统语文学派。“这一派从沙畹以至于伯希和与马伯乐,可谓登峰造极。其特长与弱点,均已暴露无遗。……社会学派的更大贡献即在乎方法。亦正是这样的方法,乃最能济语文学之穷而补其短。”

王静如的分析略有不同,结论要旨则完全一致。他将法国汉学分为三期,兴隆期用语文考据法,儒莲为代表;大成期为史语方法(含考古、语言、宗教、民族、艺术及科学等辅助学科),沙畹创始,伯希和走到巅峰。发扬期以史语方法加社会学方法,葛兰言独放异彩。由于沙畹、伯希和等人全力用于写史以前的工作,无法写出完全美备且理论精透的中国历史,葛兰言以社会学方法理董中国史语文献,便可由考史进而写史。此说似得到法国学术界的印证,葛兰言的《中国古代节令与歌谣》、《中国人之宗教》、《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等书,连获法国汉学研究最高荣誉的儒莲奖,而所著《中国上古文明论》、《中国思想论》,则由法国新史学运动大师白尔(Henri Berr)主编的“人类演化丛书”出版。白氏倡导综合史学,同人多为《社会学年刊》的合作者,可以说是影响本世纪史学最大的法国年鉴学派的源头之一。因此杨、王二人均预言葛兰言所开创的社会学派,将起而取代语文学派成为西方汉学的代表。

与伯希和、高本汉、马伯乐等人久为中国学者所称道的情形相反,葛兰言以社会学方法解析中国古史的创新,在中国本土却长时间反应平平。1929年其《中国上古文明论》出版后,更引起强烈批评。1931年,丁文江在英文《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The Chinese Social and Political Science)第15卷第2期发表长篇评论,对葛兰言的著作乃至人品予以严厉抨击和讽刺。丁氏虽不是史学专家,但是地质学家兼通文化人类学,对中国上古史颇有研究,而且此文如果不是与傅斯年等人讨论的结果,至少写作过程中得到后者在文献等方面的帮助。后来傅斯年称赞道:“凡外国人抹杀了中国的事实而加菲薄,他总奋起抵抗,……论学如他评葛兰内的文,都是很有精彩的。”可见此文代表当时中国史学主流派的观点。王静如说葛的“观念很有些和国内大学者意见不同”,或即指此。此后直到1939年,杨 才在英文《燕京社会学界》(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撰文介绍葛氏的学历承方法,并对丁文江的批评有所回应。1940年代,杨 又在北京的中文《社会科学季刊》连载内容更为详尽的《葛兰言研究导论》。王静如于1943年在北京中法汉学研究所演讲《二十世纪之法国汉学及其对于中国学术之影响》,也重点介绍了葛兰言的学术方法。但是代辩诸文发表于日本占领时期,与大后方的学术联系基本隔绝,远不及丁文江的影响深远。所以杨 不无认真地称葛兰言之名不显于中国,是不幸遇到了丁文江这样的对手。

个人的作用还应乎时势。中国学术界对葛兰言感到生疏,除了他后来不到中国,与中国学者缺少联络,著作译成中英文的少而且晚,以及治学方法与中国新旧两派史学家和国学家俱不相合,而中国的社会学者对于国学和西洋汉学一向不大注意,不能打通之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其方法与中国史学的特性不尽吻合。此点于近代以来中外学术的相互关系至为重要。

在欧洲,社会科学兴起于社会发展造成传统的人文方法力所不及之际,如与战后史学变化密切相关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若干分支,主要由研究已毁的上古社会和尚存的初民社会生成。传统人文学科尤其是历史学,以文献研究为主,辅以其他手段,目的仍在更好地通过文献研究历史。此一特征,中外一律,而中国尤为突出。因为中国有始终一贯的文字文化,保存传播的技术手段又相对发达,文献的留存极为丰富广泛。这不仅造成中国学术传统中史学特盛的局面,而且竟能影响近代新兴学科的引进发展。考古学长期以发现和印证文献为要项,文化研究则多由文史哲学界兼挑,与欧美各国反差明显,也令行内人莫名所以。葛兰言的趋新尝试,同样受此制约。当时“法兰西史学界颇有欲以社会背景之研讨代替旧派之著重个人心理之解释者”,葛氏因此想以欧洲封建社会为研究对象,后发现史料不足,才转学中文,“因为中国文化乃世界文化中最古老并最富有连续性”,适宜此类课题。可见其问题意识来自法国本身的历史研究对个人心理解释法已经发挥到极致。而欧洲汉学界包括成就最高的巴黎学派,只有极少数人开始进入中国史学的“个人心理之解释”阶段,如沙畹对《史记》的看法。同时,葛兰言所属的法国社会学派的社会学并非一般而言,“反而与我们所叫做的民族学或文化人类学,颇为相近。”其“社会学分析法在骨子里,原是一种实际调查与田野研究的方法。”葛氏曾主张以中国的乡村文化为中心,并选择受都市文化影响最少,最能保存旧日文化形态(如河南郑州一带)的一个乡村为研究对象。如果照此而行,他得到公认的机会可能更大。后来费孝通即首先避开文献的困扰,开创乡土社会研究的先例,然后回头再适应中国学术,结合文献解释皇权与绅权。葛兰言却将社会分析即对社会事实的分析直接用于历史研究,尽管他对从文献中发现史实已经十分慎重,在史家看来依然破绽百出。

丁文江的批评与杨 等人的辩护,分歧的关键在于如何看待方法与文献的关系,即以发现事实为目的的葛氏新法,是否有助于正确地从事文献中发现事实。前者指责葛兰言对文献误引错解,所称事实并非历史真相,因而怀疑其方法的适用性;后者则由介绍方法而阐明其发现事实的不同路径以及事实的不同类型。两相比较,丁文江确有误会方法之处,但所指出的事实真伪问题,并未得到正面解答。葛兰言不重视文献的真伪,而重视传说,认为文献所出时代或者较晚,所记载的传说(事实)却很古。这显然并非一概而论的通则。依据丁文江的批评,葛著至少有三类错误不容置辩:一、将理想误认为事实,如以男女分隔制为古代普遍实行,殊不知只是儒家的理念。二、误读文献而得出与自己方法相合的错误事实观念。三、先入为主地曲意取证,尤其认为《诗经》尽属农民青年男女唱和。事实一错,立论根据全失,用以发现事实的方法自然无效。所以王静如也不能不承认:“顾此失彼之事亦不能避免,故葛氏书中亦颇多误点。惟氏所用法,方在开始,史语方法训练或有未精。然如继起之人,能有沙、伯史语方法之深刻,再有葛氏社会学法之通达,则其著作必如葛氏诸书之言理持故左右逢源,且无葛氏之小訾,则混圆如一,自然颠扑不破了。”

照代辩者之见,似乎沙畹、伯希和等人不能出大著作是为方法所困。此节大有商讨余地。据杨 《葛兰言研究导论》,沙畹对于近代历史科学中一切新的方法全能运用,对于史学的一切辅助科学又全是内行,并主张以整个中国文化与整个活动的中国社会为研究对象,其附于《泰山志》(Le T'ai-Chan)一书的论文《中国古代的社神》,实为西洋中国学界空前的杰作。王静如更认为:“此文重要之点,乃在启发后之学者,走上以社会学法研究汉学之途径。”而1908年伯希和在关于敦煌遗书的报告中称:“此类卷本,在东方学上,实含二重新义。”一是增加大批写本,据此可考写本印本流变沿革,二是“自此以往,可籍文书真迹以研究东方学也。吾尝以之从事乡土之学,恒获效益。然此类效益,一经数种书籍之比勘,往往矛盾。于是有是非之分。顾藉以比勘者,不外书本而已,从未有运用碎杂未编之文书原本以从事探讨者。今则私家记录,契约状牒,灿然大备,于是此中国西陲行省,往昔仅展数种流行之载籍以窥概略者,今则七世纪至十世纪间宗教社会之真实生涯,涌现目前矣。”巴黎学派另一代表马伯乐在为法国历史评论丛书之一的《最近五十年的历史与历史家》所写的中国及中亚研究述评结语处也说:“众所周知,从来汉学研究主要致力于古代、宗教、美术及蒙古帝国时代前后的中亚,因此这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现在,用真正科学的方法叙述中国社会历史还为时尚早,希望欧洲、日本和中国人紧密协作,尽力将我们的智识投向这一最重要的空间。”可见沙畹等人均已意识到社会研究之必要,或者说,历史研究本来就应以人类社会为对象。只是史家治史须依据史料,而上古史料遗留不足或鱼龙混杂,不得不阙疑以待,首先进行史料的发掘收集整理。

另一方面，掌握并贯通古今中外的材料，本身必需绝顶聪明加长期功夫，非一般人力所能及。沙畹、伯希和以不世出的天才所达到的史语方法的深刻，几乎穷尽人力。如果葛兰言照此办法，至多与伯希和齐头并进，或犹不及。诚然，在一定的条件下，新方法的运用能够贯通若干旧史料，或扩展史料的利用。但如果脱离相关语境，一味格义附会，强作解释，则不免呼卢喝雉，图画鬼物之弊，解释愈有条理系统，则距事实真相愈远。葛兰言批评中国的汉学家“不从神话中去求真的历史事实，而反一味的因为有神话而便去疑及古书”，结果令“西方人自知汉学考据以来，便不敢再相信秦以前的书，而从此便结论到秦以前的中国史事都是假的，更从此而称中国史的古文化大都从埃及和巴比伦去的”，连马伯乐也声称秦以前中国还是“史前时代”，希望用既有资料寻求中国文化的渊源和原始形式，立意甚佳，运用方法也极为严谨系统，远非时下滥用者可比（如慎用同类比较法）。但他怀疑甲骨卜辞，又不通金铭文，且不能等待考古事业的发展，面对材料不足以征信的上古史，自然难免捉襟见肘。

更为重要的是，葛兰言在两方面从巴黎汉学研究的进展中倒退回去，一是运用文献资料的范围大为缩小，能力也有所降低。本世纪以来中国研究长足进步的要因之一，在于史料向三方面丰富扩展，即中国与外国，地上与地下，经史与一切文字资料乃至器物。同时涌现出一批能够综合运用各种资料的优秀学者。而葛兰言则局限于几种问题甚多的古籍，似乎单靠方法的改善就能发现历史事实并形成对社会的系统解释。而且尽管他提倡直接阅读原文，可是丁文江证实其大量依靠顾赛芬（Seraphan Coureur）的译文，且未与中文原本印证。而顾虽号称汉籍欧译三大师之一，所译《诗经》却是所有译本中最糟的一种。因为沙畹和理雅格（J. Legge）都有中国人帮助，顾赛芬则独力进行。此外葛氏中文能力似乎不足，一旦自己动手翻译，较顾氏尤逊一筹。二是几乎无视近代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没有一位做过文本批评的中国学者之名被提及。而他对中国传统学术的反复指责，又早已是众所周知的陈言，形同无的放矢。因此丁文江说，如果葛兰言注意到王国维等人的著作，许多错误本来不难避免。

第三节 欧风美雨论高下

丁文江批评的影响不限于禹域之内，石田干之助将此文译登于日本《民俗学》杂志，该国“东洋学界以其评Granet多知其名”，谓其将葛氏“误读谬解中国文献指摘得体无完肤”。尽管后来庆应大学教授松本信广著《古代文化论》为葛辩护，又在撰文介绍法国汉学研究时强调现在舆论虽然对葛兰言毁誉褒贬参半，自己却确认其功绩并看好将来发展，但势难挽回。京都学派对伯希和以下的法国汉学家多倾向于马伯乐，只有留法的小岛 马主张师法葛兰言。他认为其著作对于全面考察和理解中国古代社会有重要启示，不能以方法的瑕疵完全否认结论的正当，同时对葛氏将不同时代的中国文献同样看待以及天马行空式的推断亦不以为然。东京大学的和田清也不赞成学生以葛著《中国文明论》为读本，指示用马伯乐的《中国上古史》。在法国，对葛兰言似乎抑扬互见，他始终未成为法兰西学院院士，可见对其学术创新多少有所保留。

不过，杨 王静如等人的预言战后却变成现实。照戴密微和贝冢茂树所说，葛兰言所用方法，其实就是后来对民族学影响极大的结构主义。随着战后社会学和人类学对历史学的渗透日益加强，以及法国年鉴史学主导地位的确立，此法盛行一时。而汉学研究在西方的独立地位，只有在本国学术正统承认的前提下才能获得，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本国社会与人文科学发展总体趋势的制约。更有甚者，当整个人类社会的思维仍处于欧洲主导时代之际，其他文化体系的认知方式都将由此左右。京都大学的贝冢茂树后来便认为小岛 马当年选择葛兰言有先见之明，因为此时在法国葛的身价已经超过马伯乐。

葛兰言身后的成功，除方法本身日臻完善，重要原因是应用范围有所变化和扩展，或用于初民及乡村社会，或施诸近现代历史。前者对文献的依赖较小，后者则利用文献相对粗疏，给新方法提供了较大的回旋空间。

使战后国际中国研究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人物，是被称为“美国中国研究开山祖”的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欧风美雨经过一轮对垒，显出后来居上之势。然而，如果说葛兰言只是研究方法脱离中国历史及史学，费正清则在将汉学研究重心由古代下移到近现代并应用社会科学方法的同时，本质上有全面退回沙畹以前欧洲传统汉学的弊端，尽管表面看来更具现实感。

费正清以前美国的中国研究，可谓欧洲汉学的延伸或移植。“其间足以斯学生色而放大光明者，二三十年来惟三人耳：一为哥伦比亚教授夏德（F.Hirth），二为加利福尼亚教授阜克（A.Forke），三即洛佛尔（K.B.Laufer）氏也。此三人者皆条顿种，生于德国，学成于德国。”他们显然感到美国的学术风气与汉学研究多少有些格格不入，所撰论著，多送往欧洲发表出版。夏德、阜克后来回到德国，洛佛尔则坠楼身亡。1920年代初美国学者赖德烈（K.S.Latourette）承认：“中国史包藏之浩博，吾国学者稀能见之。”通常仅研究近代史而兼及数十年之变迁，“其或深思远瞩，知中国民族有其三千年继续之历史，有浩富精美之史籍，足供西方学者研究之良好资料者，殆寥寥无几焉。”1928年，费正清所在的哈佛大学成立远东语学部时，想请伯希和，后者表示谢绝，认为没有人愿意离开法国的优良学术环境，去到穷乡僻壤的哈佛，于是推荐尚无正式职位的法语俄国人叶理绥。叶在哈佛继续法国式的汉学教育，因难度过大，令从学者望而却步。这从一个侧面证明欧洲汉学家的感觉并非偏见。巴黎学派的形成发展，建立在聚集若干兼备语言和社会人文科学天赋的绝顶聪明人才之上，其来源范围后来更扩展到整个世界。但这同时也就意味着难以普及。伯希和对于巴黎学派的中衰早有预见，他对即将归国的王静如怆然道：“君来时法国汉学可谓极盛，君去后恐未必如此矣。”后进的美国更加缺乏相应条件。在当时美国学生眼中，伯希和宛如神祇。洪业指出其今古文《尚书》章节对照的错误，学生竟说：“伯希和从来不会弄错的。”费正清面临的问题，与其说是将汉学研究推进一步，不如说是如何使少数天才的事业变成多数凡人的职业。批量培养标准化的学位获得者，正是其方法的成功标志与应用价值。

文章录入：zhangzhiyong 责任编辑：zhangzhiyong

- 上一篇文章： 韩国的中国现代史研究现状与前景
- 下一篇文章： 二十世纪欧洲汉学

[【发表评论】](#) [【加入收藏】](#) [【告诉好友】](#) [【打印此文】](#) [【关闭窗口】](#)

最新热点

最新推荐

相关文章

- 胡适与俞平伯
- “纪念亚洲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 瞿同祖（近代史研究所）
- 杨天石（近代史研究所）
- 蒋大椿（近代史研究所）
- 张海鹏（近代史研究所）
- 朱东安（近代史研究所）
- 虞和平（近代史研究所）
- 闻黎明（近代史研究所）
- 姜涛（近代史研究所）

 网友评论：（只显示最新10条。评论内容只代表网友观点，与本站立场无关！）

